【2015年7-8月】社会科学新论

本期新论目录

高校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以问题为导向调整学科方向

学术创新需要全球视野与本土视角 依赖中国经验

论中国教育—科学管理体制

高校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以问题为导向调整学科方向

田建国

走出“封闭保守”，以问题为导向调整学科方向

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学科方向。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现在相同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学科，由于主攻方向不一样，往往在产生的效益、贡献上有很大差别。上一轮全国重点学科评估，清华大学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学科，学术得分都是第一，但是综合得分都只拿了第二。自动化学科综合排名第一的是东北大学，因为它为鞍钢的技术改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计算机学科排名第一的是国防科技大学，因为它对国防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学科排名说明，现在高校学科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重视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地方经济社会的增长点在哪里，学科专业就办到哪里，而且学科建设不仅要跟着社会跑，甚至要领着社会跑。

过去我们的学科建设是自我发展、自我循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是根据自身学科设置运行的，无视社会发展，无视外界评论。这种封闭保守的学科理念必须改变。这就要求我们从以学科为导向改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问题中蕴含着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问题中蕴含着学科延伸的广阔空间，问题中蕴含着学科机理的不断改变。从学科发展上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从学科内涵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调整学科方向的根基所在。如此，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解决问题，有创造力、贡献力，而不是在本学科内自娱自乐、自我欣赏。

科学史证明，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天才性贡献，一定是因为人类的需求、国家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为世界贡献的诺贝尔奖并不多，但是斯坦福贡献了硅谷和乔布斯等，被认为是当前世界最有活力的地方。斯坦福着眼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瞄准行业共性技术，以学科群对准产业群，实现学科链转为产业链，集群化推动产学研合作，它贡献的一个个产业链，一个个公司都是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需要。大学搞产业，要搞就搞有助于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创性的产业链，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成果。

以问题为导向调整学科方向，也是保证学科长盛不衰的法宝。著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140年历史中出了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先后五次在学术上改变了主攻方向。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一个以物理学前沿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世界著名实验室，利用物理学发展出的仪器和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转而重点从事天文和生物研究，在这两个新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开辟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崭新领域。在天文学上发现了类星体和脉冲星，赖尔和休伊什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分子生物学上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克里克和华生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的大学也是在不断调整学科方向中实现了大的发展。自20世纪中叶，它们通过自身变革，建立学科创新动力机制，促进了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互联网以及正在兴起的第五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美国经济社会的五次跨越式发展。2010年，美国又在学科发展方向上提出，教育要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学必须开始培养相应的劳动力，在课程安排上要把重点转移到智能制造、新能源、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地球科学、生态学、系统理论及各种职业技能上，创造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突破性技术。

当然，调整学科方向要注意内涵调整和提升，动不动在名称上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2013年预算为7.22亿美元，拥有4000名员工，800名学生，已经涌现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核物理的重要学派，可它依然叫实验室。

“有所不为”，整合集聚优化学科

学科建设战略上要讲“有所为有所不为”，战术上要讲“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往往要比有所为更难。1969年，斯坦福大学撤销了建筑学院，尽管当时其在全美建筑学院排名前10至12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建筑学院投入很大，要进前5位所付出的代价有些不值；二是“近邻”加州伯克利已有一所美国顶尖的建筑学院。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学科建设不能齐头并进，

因为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只有舍得放弃，才能集中力量，做强自己。学科发展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不属于这个目标的，就应该舍弃。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增加是一种发展，学科减少，重新优化组合了，强势更强了，同样也是一种发展。学科发展不能盲目扩张，盲目铺摊子。要以核心强势学科为圆心，向周边拓展，发展支撑学科，建设新的学科，把没有明显优势的学科整合到强势学科支撑体系中去，实现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统筹发展。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要做强，新兴学科、应用学科要“出新”，传统学科要搞活。

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进行学科布局时，每一位教授都会据理力争说自己的学科最重要，甚至说撤销自己学科或不增加自己学科投入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其实，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情绪。

整合、集聚、优化学科，就要重视学科交叉融合。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是因为实验室主任布腊格从学科交叉中发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才激活了知识（物理学知识）与科学的需求（生物学和天文学本身的内在发展要求），实现了它们之间的有效碰撞。交叉出新意，交叉出活力，高校的学科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产学研合作，因为现在的学科发展在边缘交叉领域最能形成突破点。当然，学科综合集成是有选择的综合交叉，是把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最优化的组装，使其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潜能。高校必须运用交叉力量，构筑学科群落，构建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平台，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突出重点，切忌“一片高原、没有高峰”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要造峰，优先重点支持一批可以尽快进入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重点学科，从而彻底改变当前高校学科建设中“一片高原、没有高峰”，甚至是“一片平原”的状况。在这方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验值得借鉴。加州伯克利原来有化学学院、工程学院等 14 个学院，下设 100 多个学科系，各个学科发展非常均衡，每个学科水平都很高，就是没有一个学科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特色不明显，因而始终进入不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每个领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后来发现这不可能。于是，他们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力量，重点发展原子生物工程，要求学校的每个系都尽量去和原子生物挂钩，以形成自己特色。经过几年努力，终于促进劳伦斯发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发明了加速器，加州伯克利拿了 17 个诺贝尔奖，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成了世界第一，学校因此世界闻名。

加州伯克利的做法告诉我们，精心培育特色学科，是重点学科建设的根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重点，就是水平。特色就是不求大、不求全，只求不可替代。特色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突破口；特色是异峰突起，出奇制胜的切入点。

高校规模不在大小，关键在于优势和特色；学科建设不在齐全，关键在于实力和创新。重点学科建设必须突出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新。其中，“人无我有”是特色的特殊层面。只要人无我有，无论实力是否强，研究是否前沿，都可看作学科建设中的特色。对于人无我有的学科，最重要的是要看准学科发展方向，提出跨越式发展思路。“人有我强”是一般层面，学科建设特色更多反映在实力上，反映在学科群的综合协调发展上。学科竞争最终要看实力。“人强我新”是学科建设中的最高层面，它强调创新水平和领先地位。

在培育学科特色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意思就是说各校有不同的学科特色。尽管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综合性大学，或者在朝综合性迈进，但并不是说它们的所有学科均为一流学科。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哈佛大学的一流学科是法学、医学；斯坦福大学一流学科是心理学、电子学；剑桥大学一流学科是物理学、生物学；牛津大学一流学科是数学、政治学。一所大学如果能在整体学科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有一两个学科具备一流的影响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加州伯克利原校长田长霖先生曾这样讲：“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因为一所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想办法扶植最优异和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待它有名气了，其他学科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上来。

重点学科建设还要发挥领军人才的重要作用。牛津大学因为罗素的哲学成就，使牛津大学成为当时世界哲学研究中心。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当年就因为引进了爱因斯坦，加州理工学院就因为引进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名校。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的成功也是因为聘请了黑格尔、谢林、雅可比等一批世界级大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培养学科带头人、名师、名家，也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来源：光明日报 2015 年 7 月 28 日，作者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创新需要全球视野与本土视角 依赖中国经验

张康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从自觉到自主的发展历程。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学习和借鉴方面。近年来，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话题经常被人们提起，说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始从自觉的过程转向自主的轨道，意味着即将开启学术创新的进程。所谓学术创新就是自主探索，以下三个基本方面是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加以注意的。

需要拥有本土视角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全球化。这决定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拥有全球视野，关注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但是，全球视野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视角，这个视角应是中国视角。其二，后工业化。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在 20 世纪后期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类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既有的理论、思想以及经验都不足以对开拓走向未来的道路形成充分的支持，唯有探索和创新才能引领人类前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缺乏问题。西方是工业社会的发源地，也是工业社会的主要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活动更多地表现为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状况。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走过了这个阶段后，就应注意防止这种学习和借鉴成为一种路径依赖。尽管在任何时候，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都是必要的，但不应拘泥于学习和借鉴，更不应无选择地移植。社会的发展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开始遇到诸多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的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整个世界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从既有的理论和思想出发，也不足以提供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可行方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站在与西方学者同样的起跑线上，用自己的探索和创新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社会现实，这决定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应是地域性的研究，而需要把全球都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然而，我们也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同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和问题解决方案会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希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成果，就不能从西方的或其他的视角出发，而是需要有一个本土视角。没有本土视角，

我们就不可能为人类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要素，也就不可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当然，科学有着一些一般性的原理，科学研究工作也需要遵循一些一般性的规律，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独特的视角。中国近 30 年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却又存在着创新不足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的视角尚未确立。所以，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起本土视角。当然，这不可能由某个人来确立，而应当是中国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共同追求并为之努力的事业。如果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实现的知识扩散已经把源于西方的科学、理论、思想以及价值观传播到了世界，那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在科学研究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就必须确立起一个本土视角。

应当拥有本土关怀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应优先服务于解决中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者只有首先解决了中国问题，才能对世界作出贡献，如果中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所形成的理论、思想和经验就可以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甚至可以树立起一个样板，让其他国家认识到并加以学习和借鉴。这应当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近年来，特别是在中国高等院校中，旨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到忽视，一种严重的片面追求影响因子的学术导向愈演愈烈。在这种错误导向下，鼓励甚至迫使学者们到国外去发表文章。这显然不是一种让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中国现实的做法。因为，如果这些学术成果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为什么首先要到国外去发表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出于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需要，甚至认为这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试想，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去解决中国问题，或者说不能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发挥作用，这种学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产生世界影响？如果这些研究没有转化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成果，又谈何国家软实力呢？

我们经常说，科学无国界，如果人文社会科学也能归入到科学范畴中的话，我们的研究应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比如，能够转化为先进武器的相关研究如果提供给恐怖主义者，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为什么国际社会有着核不扩散条约？这就说明科学研究的成果应当由谁来掌握是一个问题。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应专注于具体的问题，因为只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达到了较为深入的地步，取得了重要成果，才能够对

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地域性色彩更加明显，这决定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首先表现出本土关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可以作用于现实的经济社会建设的，而且能够发挥正能量。当我们的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机构鼓励学者到国外发表文章，或者说，抑制学者们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事实上是在拒斥这个人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当国家提出创新要求时，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就充分暴露了出来，现在到了需要加以纠正的时候。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最大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解决现实问题，在研究工作者这里，就是一个如何开展创新性的理论和思想建构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些追求到西方去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存在着迎合西方学术话语的问题，很难称得上创新性成果。这种学术倾向过度发展，必然会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引向颓废的方向，从而形成一种拒绝创新、畏惧创新、压制创新的学术氛围，进而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危害。所以，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必须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会怀疑。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其相称的？尽管我们可以指出，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了方针政策，但是，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也可以为世界学习和借鉴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出现，或者说，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大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在中国，有两个方面的丰厚学术资源。首先是中国的传统。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治理实践方面，中国传统中都有着许多可以进行总结的经验。事实上，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和思想能构成一个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话语环境中思考，并充分地运用这个话语体系的话，是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作出新探索的。但是，从中国传统出发去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只意味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提供一些中国既有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思想中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还应认识到中国所拥有的另一种学术资源，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它们是一些有生命力的、活的素材，是在解决当下现实问题中形成的。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应从这里出发。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后工业化的压力，西方国家的诸多改革是

要解决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中国社会既需要补工业化的课，同时又同西方一样遇到了后工业化的压力。因而，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其实是把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从世界范围看，只有中国同时承担起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项课题，而且在此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中，肯定包含着极其可贵的独特经验。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需要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和分析，并从这些经验出发去进行理论和学术创新，这将是一个无比伟大的科学事业。

没有人怀疑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没有相应伟大的理论、思想和学术成果相伴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应在这个时代缺位，应踏踏实实地总结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从中找到一些可以传诸后世的经验。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具有全新的性质，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都面临着重建的要求。特别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受到危机事件频发等问题的困扰时，我们需要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和理论创新去为我们描绘走向未来的道路。这是中国学者应当承担起来的使命，也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论中国教育—科学管理体制

论点摘编：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的话语权和国家安全。相较于中国实践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建基于他国经验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这种缺少解释自己的话语权，进而缺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危机状况，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的必然产物，更因工科化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而加剧。因此，改革等级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及经费分配体制，加大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培养怀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历史—理论—现实三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自主性的出路，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